阶层和谐 路在何方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杨继绳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陆 震

杨继绳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敢说真话，在我所敬重的人中间，他的位置是比较靠前的。他的《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很好读，内容丰富翔实，行文明快犀利，非新闻高手不能为。与同类著作相比，杨著最可观之处还是一个“真”字。首先是真实，记实是全书的主体，他自己说是想“介绍有关社会阶层的一些情况，”以我的阅读所及，这个“介绍”全是干货，不掺水分。比如关于农民和工人两大群体社会地位、利益处境的演变，如何从国家主人和国体的基础，变成今天高度边缘化的弱势人群，整个过程的叙述让人刻骨铭心。其次是真知，杨先生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情况的分析，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可略引数段为证：

其一，“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机制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

其二，“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是扭曲的：改革受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极其亲属和朋友，改革受益较少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其三，“市场经济的惟利是图和‘审批权力’的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形成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

其四，“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对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说别的，仅凭上述识见，花36元买杨先生的书就值。

再有就是真情。杨先生的真实、真知、真话。反映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这种真情蕴涵全书而溢于言表，令人心潮起伏，热血上涌。

好书总会引起读者对它更多的希冀与期待，杨著当然不例外。全书介绍了九个阶层的情况，其中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官员的定位标准是：“他们的苦难在于队伍太庞大——农民；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阶层——官员。”这样的定位也许是反复思之的结果，但从道理上、事实上、逻辑上看，难以成立。

为什么人多了，就会苦难？生活中的事实是人多势众，人多为王，民主制度就是人多的那边说了算，尽管也必须尊重人少的那一边的权利与利益。不错，在中国确实有相当一批所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鼓吹农民的苦难在于他们人太多，这些人从马尔萨斯那里取用了最烂的糟粕而不自知，我怎么也不明白，杨先生会受他们的影响。试试让农民自己作主，看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多的苦难！不仅农民这样，任何一个群体、阶层，人多也好，人少也罢，只要不能自己作主，只要身不由己地被人“运动”、忽悠，都只能除了苦难还是苦难。

说工人是改革阵痛的承受者，这个“阵痛”的时间未免太长了，用“阵痛”来比喻工人所受的的苦难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工人已经痛了快30年了，不光是生活的痛，身体的痛，而是彻骨彻心的痛。是由九霄之上跌到边缘群体、弱势人群的痛。

说当代中国的4000万知识分子依然是一个忧愤深广的阶层，大概在知识分子中也没有几个人会同意。有人计算现在至少有1000万知识分子忙于致富，他们即使有那份忧愤的心，也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忧愤。其实，不管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想发财，多少人想做官，多少人既想发财又想做官，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碎片化。清华大学孙立平先生曾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上层雾头化和下层碎片化的见解，在下层碎片化中，知识分子阶层遥遥领先。

说官员阶层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忍辱负重的群体，这是离事实最远的童话。官员的地位、待遇、工作、生活、精神状态，哪点与“辱”“重”连得起来？现在报考公务员的人这么多，如果他们都是为了去忍辱负重，那中国何止是现代化，早就成了伊甸园了。“忍辱负重”几个字放在工人、农民（包括农民工）这两个阶层头上才合适，当代中国还有比他们更受辱、更负重的吗？

迄今为止，近几年关于阶层研究的著作与论文和主流媒体对阶层研究的宗旨，都定位在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杨著也是这样。这没有错。但稳定与和谐为了什么？是为了能使各个阶层的人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权力，有按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不明确这个最终目的，稳定、和谐云云不但不着边际，而且面目可疑。能否真的以人为本，把使每个人活得像个人作为阶层研究的终极目的，不但决定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稳定——是传统封建社会的那种超稳态的稳定还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宪政稳定，什么样的和谐——压制一切差异的和谐还是百家争鸣的和谐，而且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走向稳定与和谐。比如，杨先生提出的促进阶层和谐之道是救助下层，制约上层。那么，谁来救助下层，人家不愿救助怎么办；谁来制约上层？靠下层，凭什么？能制约上层的下层还需要上层救助？靠上层自己制约自己，可能吗？其实，在以人治为特征的旧体制中怎样转圈，也不会有通向阶层和谐的道路。这一点，毛泽东1945年7月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话”中就已明示，它就是民主之路。

文化贸易的个体选择

——读《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

□朱近野

每当我们谈起各地方言、传统戏曲或是圣诞节，争执很可能随之而来。我在读大学时，就参加过多次诸如“是否有必要在广州这样的地方提倡普通话”、“把元宵节说成中国情人节是不是太傻了”的混战。或许你从中可以感觉到，我们生活的位置多么奇妙，仿佛就在一张薄薄的膜上，在这层膜一侧之外的部分，叫做世界，另一侧外面的部分就叫做地方。身处这样的情境，再来考虑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真是个难题。但明白界限就更容易寻找道路，至少还可以像经济学家一样，搁置立场，分析因果。

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一书中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他在形形色色的“全球化”中，选择文化产品的全球贸易作为目标，力求检验这种贸易会对文化多样性产生什么影响。这位经济学家介入文化与艺术的论争前准备相当充分，他运用“贸易利得”（Gain from trade）模型来解释文化交流，当文化交流被承认是一种自愿贸易，而非强加于人的文化侵略时，其利与害，总得根据贸易双方的得失来谈。贸易利得模型本是用来计算自愿贸易下所增加的福利总额，在这里让问题更为明显直接——文化贸易是否令交易双方日子改善、文化生活更为丰富、拥有更多选择，这正是经济学家的特长。

“多样性”这个概念众说纷纭，“比如，社会内的多样性指的是这个社会选择菜单的丰富程度。然而许多全球化的批评者所关注的却是社会间的多样性”，前者以个体选择为判断基础，后者并不关心个体所面临的选择。考恩对多样性的经济度量包含两者，但更注重社会内部个体成员所拥有的选择可能，并且提出“有效的多样性”（operative diversity）概念，把我们能够实际享受到多少种多样性的好处与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种多样性区分开来。

根据对出版业、互联网、餐饮业的研究，考恩认识到文化的同质化和异质化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同时出现在增长的市场当中。以我的经验为例，豆瓣网的出现，一方面更强化了畅销读物风行市场的威势，在另一面，也能让一本作者默默无闻的小说仅有的几个爱好者相互联络，更方便地为他们提供网络书店的购买链接、以及优惠购买的信息，而借助SNS或Blog，关于这本书的心得会被传递给趣味接近的读者，从而带来更多的购买行为。而考恩在书中所举的餐饮业例子也很有趣：连锁餐馆在全世界扩展，看似令餐饮市场日益同质化，但对各个社区的居民而言，现实的变化是可以消费的食品种类终于增加了。更为重要的是，连锁餐馆所代表的质量标准和品牌价值促使整个行业努力提供同样的质量标准和品牌价值，而这在市场上的表现，就是新品牌的产生和整体创新氛围的改善。这不难证实，麦当劳的市场优势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中国本土快餐企业都力求食品质量口感稳定均一，并提供比以往零散状态下更好的服务和就餐环境。倘若不信，看看挂着“成都小吃”牌子的小店铺最近几年内的变化就可以了。

然而，一旦回到文化所固有的价值观和偏好问题上，考恩也不得不承认：即使他运用前面的分析确认全球化能够为社会个体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重视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事实上对民族、地区或者部落身份认同更为执着的人们，也不会因此就放弃自己的立场。个人选择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何者更为优先？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任何想给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做最终解答的人。考恩的解答之道是，在这种更接近于心理方面的选择题里，首先要谨慎，然后要注意文化身份的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停变化的。虽然新的文化身份认同标志未必比旧的好，就好像中山装、旗袍、汉服，难说哪个更代表中国人一样，但全球文化贸易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个体的选择机会，实际上也扩大了文化身份认同标志的选择机会。或许哪天，中国人的象征物会是IC芯片呢！

《创造性破坏》
——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
（美）泰勒·考恩 著
王志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效公司出品

咳！汇率那档子事

《不要玩弄汇率》
向松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出版

□东方愚

向松祚先生很谦虚，虽是“欧元之父”蒙代尔的学生，学术上建树颇丰，但他在《不要玩弄汇率》中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旁观者的抗议。我理解他所谓的旁观者，意指是他既不是政府智囊团成员，也不在学术圈。他是华友世纪的董事长，一个商人；所谓商人，在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剔除掉那些浮华的东西，直击核心，而不是陷入利益集团与学院式的派系争斗和口水辩论当中。

他的这一脾性开卷就能感受到，没有引经据典、拉古扯今，而是直接列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十大谬论”，如人民币升值能够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浮动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灵活性等等，然后逐一驳斥。商人最明是非，他的驳斥也甚为“无情”。在提到宋国青利用某贸易条件指标，得出中国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或恶化的结论时，他颇带讽刺口吻道：“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他们用的是哪个指标。”

一般的著述，面对这类学术观点的冲突，总要把几个贸易条件列出来，把汇率理论也搬将出来，去伪存真，论个界限分明、一清二楚。可是向松祚却饶有兴趣地站在商人的立场上说事：出口价格上升或下降，是商人们的生意决策，取决于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贸易条件恶化或出口价格降低，并不意味着自己吃亏了，更与“贫困性增长”没有因果关系。

或许商人眼中的汇率大抵如此，不管你的头衔如何，也不管你采用的是哪种研究方法，若不能完全阐释真实世界的变化，一切皆是枉然。除了宋国青外，向松祚对弥尔顿·弗里德曼、米德、约翰逊等经济学大师对汇率观的批判也是不依不挠，他把这些人称之为“荒唐的顶级经济学大师”，理由是，他们罔顾事实，把真实的世界设想得太简单了。

浮动汇率支持者将价格与汇率的关系给理想化了，并且漠视了预期、不确定性、各种政治经济金融风险对汇率的重大冲击。这一软肋显然容易被人抓住。向松祚直陈：企业家天天抱怨浮动利率之危害，经济学者却依然重弹汇率浮动优越之老调；“鉴古知今，经济学者必须反躬自省，经济学教科书亦当重写。”

事实上，弗里德曼于2002年90大寿时，对浮动汇率理念已有所改变，趋向认为任何货币制度都需要有一个“锚”。然而此锚未明，弗老人已西去。不过近年来硝烟弥漫的汇率之争当中，一些原先捍卫浮动汇率的学者，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找起那个“锚”来。所谓“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细心的人能体味到，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因为浮动汇率并不能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被动应付汇率动荡的机会成本不可低估。

美国华盛顿卡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最近在《财经》年刊上发表文章称，中国货币政策的一大问题是“收收放放”的循环，以行政手段遏制货币和信贷扩张是有限的，且破坏了市场机制，导致了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腐败，公众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投资决策被政治化。于是他呼吁，中国要想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就需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法治化、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但是在我看来，此市场化非彼市场化，在中国，所谓的市场化汇率机制，恰恰可能是另一种“收收放放”的循环，预期、不确定性等因素无一不会产生逆向的投机激励。

我的一些朋友常感慨，现在的经济学者，少有像弗里德曼、蒙代尔一样，旗帜鲜明表明自己对浮动或固定汇率机制的热爱了。官员型学者考虑到自己话语权重的影响，常含混其辞，这自然有情可缘，一些所谓的汇率问题专家，却也每每就事论事，甚至不时当一下“墙头草”，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从这一层面上看，向松祚“不要玩弄汇率”的书名，或许能给这一群体提个醒：观点可以相左，但屁股不能东坐一把西坐一把。

事实上，政治元素在汇率问题上的掺杂，使得这一经济命题变得非常复杂。向松祚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履行国际承诺、肆意大搞财经赤字和货币扩张，“金本位制如是，布协顿森林体系如是，今日相对稳定之国际货币环境亦如是；应该指责的不是固定汇率制，而是各国某些政治家的不负责任、胆大妄为。”反观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不乏盲目政治使命感刺激下的货币政策行为与观点。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说，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汇率不是儿戏，单个人可以不幸福，但你却不能轻率地玩弄汇率而使更多的中国人不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玩弄汇率》虽笔墨轻松而犀利，并且不乏幽默，但它绝不是一本“大话”之作，仍是一本严肃的读物——虽事关政经大局，但也与个人福祉休戚相关。

■新书过眼

《自动百万富翁》

(美)戴维·巴赫 著
鲁刚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2月出版

戴维·巴赫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聪明女士的致富之道”特别节目主持人，在美国在线网上，他是一位投资理财教练，并主持他自己在全国范围播出的联合广播节目“和戴维·巴赫一起变得富有”。他的主题讲座在所有投资理财类讲座通过数千名财务顾问的传播和推广，1700多个城市的人们有机会聆听到他的洞见。在这本从书名上看就非常吸引人的书中，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能够让一般的寻常人士而非成功人士积聚财富的办法，而且很轻松。他的“一步式”投资理财计划把复杂的金钱世界化繁为简：学会让金钱为我们服务，即使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为我们效劳。同时还要尽情享受生活。诀窍是，每次挣到了一美元，都应该先给自己留一部分，之后再付账单，留下的部分拿去投资、理财。这对于美国人当然有典型的指导意义，对于大量引入西方消费理念的中国人呢？

《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

(美)安迪·格鲁夫 著
巫宗融 译
中信出版社
2007年1月出版

与大部分顶尖商学院用来培训高层经理人的教程不同，这本处处闪烁着格鲁夫实战管理智慧和洞见的手册，有能带给肩负承上启下职责的中层经理人更多教益的实例教案。格氏是地道的名校大牌教授，但显然他在英特尔数十年的经历更为读者珍视。比如，他以“理中有事，事中有理，事必言理，理必在事”来论述“会议技巧”、“激励”、“培训之道”、“招人与留人”等攸关中层经理人事业绩效表现方式，提出“混血型组织”与“双重报告”体制等等。今天广为流行的“知识管理”，格鲁夫1983年就在英特尔大力推行了。他的“决策由离问题最近而且最了解问题的人来做出”的主张，正是“管理双权理论——知识权与管理权合一”的先声。不妨听听他对后e—mial时代的分析：20年前日企办公室的大方桌因能随时传递信息而势如破竹，今天，美国的电子邮件战胜了日本的大方桌，而这还只是未来25年大趋势的开端。

《办公室里的大猴子》

——职场丛林的生存法则

(美)理查德·康尼夫 著
容 冰 译
中信出版社
2007年1月出版

在遗传方面，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近似度约为99%。这两个物种之间大约有2.5万个基因是相同的，不同的基因可能还不到50个，但是，商业人士看来都没有意识到这对我们的职场生活意味着什么。管理者们竭尽全力压制人性元素——而不是抑制兽行元素，致使公司运作犹如机器运作。在个人生活中，公司员工也倾向于将人性视为有待征服之物。话虽如此，但康尼夫承认，以动物的行为来推测人类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因为听者会认为这样的比较带有侮辱性。不过呢，经历过从行政套房谈话到与食人鱼在亚马逊河游泳、从上议院议员客厅里的下午茶到撞车比赛等多种世面的康尼夫要大家仔细想想，其实这样的比较很有启发性。因为职场遵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以，真正的动物能教给我们在办公室丛林里更好的生存之道。

《太阳帝国》

(英)詹·格·巴拉德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英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新浪潮派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科幻小说之王”美誉的巴拉德，1930年在上海出生，珍珠港事变后，被日军羁押在龙华集中营；1946年，他和父母返回英国。他在剑桥修读医学两年，接着做过广告拟稿员和搬运工人，后来参加英国皇家空军。这本写他童年经历的小说原著出版于1985年，讲述叫杰姆的英国男孩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与父母失散，流落上海街头，后被日军关入拘留营，历经磨难。小说成为英国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的提名作品，稍后又被科幻片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成轰动一时的巨片，这是1949年以来首部进入中国大陆拍摄的好莱坞大制作影片。国内文学界对此书有较高评价，认为小说冲破了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记录了“一个孩子对战争的本能感悟”，对上海来说，则是“一段上海文化史的缩影”。在本书所描述的年代成名的翻译家董乐山，译完本书后离世，又给本书添了一层特别意义。